

党史上仅一次公祭领导人母亲

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为党的领导人的母亲举行的公祭仪式。

下午2时,延安各界代表1000多人集结在杨家岭大礼堂,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均参加了此次追悼大会。

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灵前香烟缭绕,灵幕上高悬着“精神不朽”的大红旗。悼堂四周挂满了延安各界的挽联。中共中央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挽联为“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保好家风”。



朱德母亲,绘像

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生于1858年,祖辈靠卖艺为生。

朱德在祭文中回忆道: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母亲总是

天不亮就起床。母亲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纱,还要与家里的其他妇女轮班做饭。家里的生活很苦,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由于过多的生育,繁重的劳动,贫寒的生活,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苍老和憔悴。朱德深受母亲的影响,他在祭文中对母亲满含感激之情。

钟太夫人逝世后,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表示哀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的唁电说:“惊闻之余,至深哀悼。太夫人福寿全归,母仪永耀,尚望勉抑孟思,无过哀毁。”

而朱德母亲去世之日,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显露于东方之时。中国共产党召开这次追悼大会,正是为了号召大家以朱德母亲为榜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

一周党史

1919年7月14日

《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给予了高度评价。《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文件。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1960年7月16日

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苏联将在华担负重要任务的1390名专家全部撤回,同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领袖家风

方志敏拒绝用公款救助亲属

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为此,国民党政府及军阀将他视为心腹大患,把他的家烧,劫十余次,以致生活捉襟见肘。为改善生活,方志敏的婶婶曾带着他的母亲,走了几十里山路找到方志敏,希望能拿点钱给母亲做条裤子,再帮婶婶们买点盐。方志敏看到饥寒交迫的母亲和婶婶,声泪俱下,他告诉母亲:“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信江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有个头,我们每人的饭钵才七分呢。”当方志敏的婶婶向他讨盐钱时,他回答说:“我管的花边不少,几十万几百万也有。不过都是革命的花边,一个铜板也动不得。要是我拿革命的花边来给婶婶们买盐,这穷人的主席我还当得?”

后来,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不幸被捕,妻兄向方志敏要四百大洋的保释费,方志敏听后摇头拒绝了。他说,政府的钱来得不易,可以做许多事,还是另想办法。最后缪敏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获救。

方志敏始终过着清贫朴素的生活。他虽曾担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政委等要职,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经手数百万元款项,但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深知根据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希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为工农谋福利上。

据《人民日报》

党指挥枪的由来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兵,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顿。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氓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简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据党建网

人民这样褒奖他:要吃米,找万里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

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

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

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地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给予了充分肯定。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据人民网

雪山之巅吃“冰激凌”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天险大渡河后,根据中共中央“向北走雪山草地,避开人烟稠密地区”的决定,昼夜突进北上。

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夹金山,对于双腿负过重伤的陈赓来说,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他豪情满怀,脸上总是挂满笑容,不仅身先士卒,困难时还总带头高呼口号:“千万不要坐下!坚持就是胜利!”

在陈赓的鼓励下,干部团终于征服了长征中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后来,陈赓和干部团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等数座大雪山。每爬一座雪山就增长一份经验,等到爬最后一座大雪山——海拔5000多米的打鼓山

时,就已经经验十足了。

陈赓登上打鼓山顶,眺望四周,但见远远近近的峰峦都被冰雪覆盖着,在阳光照射下,闪耀出万道银光,那景色真是美极了。这时,宋任穷、萧劲光、毕士悌、郭化若、周士第、李一氓、罗贵波、莫文骅、冯雪峰等干部团的领导和教员都聚拢过来。大家又饥又渴。忽然有人提议:这雪要是拌上白糖,一定很好吃,我们吃“冰激凌”吧!

话音刚落,在场人齐声叫好。大家纷纷解下漱口杯,从雪堆下层挖出最洁白的雪盛在缸子里。

李一氓说:“谁有糖精,拿出来公开。”于是,从萧劲光的小纸包里、毕士悌的“胃锁”药瓶子里、

郭化若的“清道丸”瓶子里,倒出了最后剩余的一点糖。大家边吃边赞美这“冰激凌”的味道鲜美。

周士第说:“我这杯冰激凌,比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

陈赓接口:“我的比乐园的更美。”周士第反问:“乐园给了你多少宣传费?”

陈赓哈哈大笑:“冠生园的广告费,大概花得也不少。”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号召红军将士撰写长征回忆录。周士第就把雪山山顶这个小插曲,写成一篇文章《吃冰激凌》的短文,被收入《红军长征记》一书中。红军将士以苦为乐的乐观主义精神,令后人感叹不已。

据《解放军报》

陈云首提“抢夺知识分子”口号

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陈云还兼任了一些相关的职务。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级党委都设立青年委员会,并由陈云任中央青委书记。当时,无论是党的组织工作,还是青年工作,都遇到一个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

针对种种偏见,陈云经常提醒大家要正确看待知识分子。他在1939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

知识分子来领导的。”在此前后,他曾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了说明吸收知识分子工作的紧迫性,他还提出了“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说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大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

在延安时,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央医院的傅连璋要求入党,却无人肯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傅连璋原是福建汀州的一个个体医生,是个知识分子。红军打下汀

州时,他参加了红军。后来关闭了自己经营的西药店,带着医药器材,随军撤出汀州,也参加了长征,一路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红军到了延安以后,傅连璋被分到中央医院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以后担任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医术好,看病时也很认真。但与一般同志相处时,显得态度古板,说话生硬。中央医院里的一些同志看不惯他的这种作风,就不介绍他入党。

陈云知道了此事,就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多次找傅连璋和中央医院党支部的同志谈话,交换思想,了解傅连璋的历史情况,帮助教育他,肯定他的优点,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要求他改正。

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由陈云、王鹤寿作为傅连璋的入党介绍人,在中央医院支部大会上作了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最后通过了,吸收傅连璋加入共产党。傅连璋入党以后,工作更积极了。建国后,傅连璋还担任了卫生部副部长。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